

政治學的曖昧身份

• 王向民



喬姆斯基說，奧倫的《美國和美國的敵人》將引發一場關於美國政治學之身份的長期爭論。這本著作對政治學提出了甚麼問題呢？第一個問題：政治學是獨立於它的民族血統和歷史背景的客觀科學，還是帶有明顯的美國特徵？政治學如何忠於自由、民主？第二個問題：如何解釋該學科自我形象的內在矛盾？如果從純客觀和偏向民主價值觀的角度看待政治學，又會怎樣？

奧倫 (Ido Oren) 著，唐小松、王義桅譯：《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對手與美國政治學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一

百多年來，國內政治學研究總未擺脫「譯書先行」的困局；然譯書又多停留在經典名著的譯介與傳播，反思學科「身份」的著作甚少。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奧倫 (Ido Oren) 2003年的新著：《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對手與美

國政治學的形成》(*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就是難得的一本。從寫作體例看，該書既屬於學科史的歷史寫法，又屬於社會政治分析類著作。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伊斯頓 (David Easton) 認為該書「是對日益增多的研究美國政治學發展的文獻及時而令人興奮的補充」；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則聳人聽聞地評論說：「這部具有煽動性和啟發性的書將引發一場關於美國政治學之身份的長期爭論。」

那麼，這本著作對政治學提出了甚麼問題呢？奧倫說，第一個問題：「政治學是獨立於它的民族血統和歷史背景的客觀科學，還是帶有明顯的美國特徵？政治學如何忠於自由、民主？第二個問題：如何解釋該學科自我形象的內在矛盾？如果從純客觀和偏向民主價值觀的角度看待政治學，又會怎樣？」（頁8——中譯本頁碼，下同）用韋伯 (Max Weber) 的話說，就是學術與政治之間，政治學何去何從。

問題從何而來？奧倫坦言來自學術經歷 (英文版前言)。十年前，作者熱衷於主流對軍備競賽進行的數學與統計學研究；冷戰結束後，隨着共產主義陣營解體和民主大張

旗鼓地傳播，「民主和平論」成為新的學術主流。雖然奧倫懷疑「國家間和平是由它們政權之間共有的民主屬性來提升的」，但是統計學的科學方法論似乎又讓人不得不接受以上的研究結論。進而，奧倫意識到，必須尋找與數學、統計學研究不同的另一種根基。

「另一種根基」是甚麼呢？奧倫關聯想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美衝突前後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言論的變化。衝突前，威爾遜對德國的行政效率讚不絕口，把德國聯邦及其成員國與英、美、法等國一道看作「憲政國家」(頁50-52)；衝突爆發後，卻把德國稱作「獨裁國」(英文版前言)。由此，作者不得不進入學科史來反思政治學的「身份」，並且確定了自己的分析路徑：「把國外政權以及美國與這些政權的關係當作反映本學科面貌的鏡子。」(頁8)

疑問和切入口已經找到，還需要鋒利的刀子作為解剖工具。奧倫在研究威爾遜和伯吉斯 (John Burgess) 時發現，歷史考察具有超凡魅力，尤其是當發現概念也有其歷史生命的時候，他不禁被有別於數學和統計學研究方法的歷史方法的有效性所震撼 (英文版前言)。歷史的方法，在奧倫看來，首先意味着概念有其歷史，應當着重分析概念內涵的歷史演變；其次，應當把政治學家對同一政權的不同歷史時期的認識區別開來，考察政治學與外交政策相互作用的過程；最後，應當注重研究對象 (或者說其負載者，政治學家) 的原始檔案和文件。

奧倫構築了美國形象和世界形象彼此建構的三個固定意識形態圖景 (頁20)，或者說美國政治學

研究的三個立場。第一，抵制派 (oppositional)，認為美國的制度結構上不健全，並尋求大刀闊斧的改造；第二，民族主義者 (nationalist)，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健全的，不需要學習或借鑑國外制度；第三，妥協主義者 (accommodationist)，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在結構上是健全的，但受重大缺陷的困擾，因此可以選擇性地借鑑外國模式的某些特質。

依照以上三個意識形態圖景，奧倫按照歷史之維分析了四個歷史時期美國敵人與美國政治學形成的關係。第一個階段是歐戰德美衝突前後美國政治學形象的更移。以伯吉斯為代表負笈德國的現代政治學創始人，信奉並比附德意志帝國的雅利安民族主義理論和國家理論，這種德國崇拜一直持續到美國本土政治學家的代表威爾遜那裏；歐戰德美衝突爆發，「專制」德國與「民主」美國的二分對立加劇 (頁61)，「明確了德意志帝國的獨裁形象」(頁62)，國家理論和雅利安理論都成為犧牲品 (頁64)。

第二個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德美衝突前後美國政治學形象的更移。「1933年，在大蕭條的陰影下」(頁79)，「許多學者對納粹某些政策和實踐也表示過肯定的好奇甚至明顯的羨慕」(頁76)，尤其是「納粹的行政改革」(頁77)和「行政效率」(頁87)，「把納粹份子看成是進行『一項國家計劃的試驗』的『理想主義者』」(頁122)，公共行政學因而大盛；「二戰爆發後，……妥協主義者和不加批評的言論才讓步於直到今天仍大行其道的民族主義和無條件批評的觀點」(頁127)，對德國

奧倫構築了美國形象和世界形象彼此建構的三個固定意識形態圖景：第一，抵制派，認為美國的制度結構上不健全，並尋求大刀闊斧的改造；第二，民族主義者，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健全的，不需要學習或借鑑國外制度；第三，妥協主義者，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在結構上是健全的，但受重大缺陷的困擾，因此可以選擇性地借鑑外國模式的某些特質。

奧倫認為美國政治學家不斷採用直接或間接的比較美國與國外政權制度的方式，來確定美國的身份。衝突前，他們將外國政權形象作為修正美國錯誤的潛在模式；衝突後，美國的缺陷卻被重塑為優點，其敵人政權先前認為的優點倒成了缺陷。所以政治學是以特有的美國觀點為本，附屬於它的國家而非民主本身，從而打破了美國政治學自詡客觀、獨立、科學、附屬於民主的自我形象。

的官僚體制的崇拜，也讓位於韋伯對官僚體制的合理性表示懷疑的觀點（頁129）。

第三個階段是從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至冷戰高峰時期美國政治學話語的更替。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學者卻不願意將斯大林政權看成是極權主義專制。他們認為蘇聯是在朝更大的自由前進，並持歡迎的態度，他們還希望美國在實現經濟平等方面要向蘇聯學習」（頁142）；50年代的美國政治學卻把蘇聯視為極權主義政權，多元主義也從描述性解釋對德國國家論的批判轉向規範性命題實現對蘇聯的批判（頁148），最終美國政治學獲得「程式式民主的勝利」（頁184），民主不再是價值追求，而僅僅是一種政治技術。

第四個階段是50年代冷戰高潮時期。「許多重量級的政治學家積極投身於塑造『歐洲未來』的政治活動和『亞洲和非洲的政治鬥爭』中」（頁199），「妥協主義者曾有對改革美國政府的衝動，卻終被民族主義者改革外國政府的要求所代替」（頁205），美國高等院校、美國外交政策與情報部門三者「黏合」（頁227）在一起，從而使我們「很難理解政治學會是公正的」（頁258）。

奧倫的結論是，「美國政治學家不斷採用直接或間接的比較美國與國外政權制度的方式，來確定美國的身份」（頁20），「美國及其隨後敵手的相互塑造的形象從妥協主義向民族主義變動。衝突前，傑出的美國政治學家將外國政權形象作為修正美國錯誤的潛在模式；衝突後，美國的缺陷被重塑為優點，其敵人政權先前認為的優點倒成了缺陷」（頁275-76）。所以，「政治學是

以特有的美國觀點而書，它附屬於它的國家而非民主本身」，從而美國政治學自詡客觀、獨立、科學、附屬於民主的自我形象被打破了。

政治學如何在曖昧的學術與政治之間作出選擇，如何促進政治學的客觀性和偏向民主價值的可能是，奧倫提議，「政治學朝向反思性的方向發展……有意識地考慮到其自身學術性的歷史位置；按照闡明這些過程與其理論本身關係的方式而將歷史上的政治進程理論化」（頁282）。「通過尋找一種新的認識論方法來一道取代客觀性」（頁285），「拓展我們對以往事件的研究，在這些事件中，知識主張與政治興趣同時為同樣的學者或思想流派所推進……使服務於倫理學科目的」（頁286）。政治學回到歷史之中，而不是面向現實，似乎就是反思政治學的行進方向。

二

奧倫對政治學客觀性的質疑、對學科史極富歷史感的回溯與解釋，以及對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引入，都是耐人尋味，令人稱道的。從社會科學研究的評價標準來看，提出問題，做出很好的論證，圈畫圓了，似乎就不能找出邏輯破綻來。但是，如果我們從外圍逐漸向內進入，就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首先，作者使用的檔案材料稍嫌不夠。歷史學方法所需要的「生活史」資料，例如日記、書信、會議記錄和外交部文件等原始檔案在註釋中並不豐富。故而作者對某些資料的使用有「過度解釋」之嫌，挑

剔地說有想當然和猜測的味道。此一點在作者論證阿爾蒙德 (Gabriel A. Almond) 和官方政策曖昧關係時尤為突出。

其次，作者用結構主義對學科身份的質疑作為自己寫作的立場 (頁24)，並把這個立場作為預設前提放置到行文以前，雖然我們可以辯解說寫作的順序和思考的順序是相反的，但是他仍然無法排除論證本身就是「證明」的過程，而不是求證 (或相反的證偽) 的過程。而「證明」的解釋行為，往往會忽略其他的細節或面向，更不能說明一些例外，例如劃分選區、投票行為等政治技能的研究。質言之，本書的論證似乎帶有目的論傾向，亦即先有觀點立場，再選擇適合自己立場觀點的材料證明之，而不是歷史學分析所主張的「理解之同情」。

再次，「意識形態」概念也值得商榷。因為意識形態是「描述人類思想以避免反映它所生成的環境，或它所服務的利益」(頁275)，是一個單向過程，即環境對政治學的塑造，或「客觀性特徵」。而本書的章節安排卻是「美國的敵人和美國政治學」相互影響與塑造的雙向過程。因此，「意識形態」這一分析概念是不周延的，更恰當的說法似乎是「作為本土性的美國政治學」。這一說法是一個描述命題，而非規範命題，因此，可以具有雙向特徵，即由「他者」影響而決定其理論形態，也可以向「他者」輸出理論而成為意識形態。同時「本土性」也可以說明政治學身份的本質特徵，即政治學是一門實踐學科，只能解釋某時某地的政治形態，而不是所謂的「客觀」、「中立」的科學。至於宣稱

政治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真理，是客觀中立的理論，那是掩耳盜鈴的說法。

最後，奧倫提出政治學要走入歷史之中，即反思的政治學。但是，我們知道政治學的任務有兩個：對過去和現實的解釋，對現實問題的解決提出意見，因乎此，它才被視為實踐的社會科學。馬克思說：「以往的哲學僅僅在於解釋這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這個世界。」反思的政治學對於歷史學和哲學，甚至政治學中的解釋部分是非常適用的，然而對於解決問題卻於事無補，相反可能使人無計可出，無所適從。

進一步說，奧倫利用的「新社會學史」分析方法也值得弄清解釋界限，謹慎其解釋範圍。作者意識到概念和解釋框架的縱向歷史意義一面，但也要注意橫向解釋界限。新社會學史和建構主義的出現本身表明是對啟蒙哲學建立的現代社會科學分科體制的批判，類似的批判已經經過了兩個階段：現代哲學時期和後現代理論時期。從價值信仰看，如果說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上帝死了」是對啟蒙哲學的控訴，那麼現代哲學和後現代理論等於把啟蒙哲學建立起來的 (我們無法定義的) 真理信仰也踏死了，剩下的是多神並立或者碎片片斷。但是對於需要信仰的凡夫俗子來說，重要的是怎樣才能在這個虛無的世界上苟延殘喘，怎樣才能集聚生活的勇氣。當柏拉圖洞穴裏的人的眼睛還不能看太陽的時候，給他們一些樹蔭也許是好的。吉爾茲 (Clifford Geertz) 研究印尼、北非意識形態的意義正在於此。對於政治

奧倫提出政治學要走入歷史之中，即反思的政治學。但是，我們知道政治學的任務有兩個：對過去和現實的解釋，對現實問題的解決提出意見，因乎此，它才被視為實踐的社會科學。反思的政治學對於歷史學和哲學，甚至政治學中的解釋部分是非常適用的，然而對於解決問題卻於事無補，相反可能使人無計可出，無所適從。

學來說，它不但擔負着像歷史學解釋過去歷史的任務，更擔負着如何對當前問題進行解釋和解決的任務。思想上不辨出路的盲人並不意味着束手不前等待腐爛，即使墳墓

在前方等待，我們也要像韋伯那樣堅定地踏步前進。因此，政治學固然要反思自己的曖昧身份，更要義無反顧地前行，不管前面是否有懸崖絕壁。

嬗變中的婦女財產權

● 付海晏



白凱《中國的婦女與財產：1960-1949年》一書的出發點與邏輯在於：從宋至清中國婦女的財產權利經歷了許多重要變化，其變化在二十世紀民法改革後尤為深刻。只有研究中國婦女財產權利的變化，我們才能對中國財產權利的整體變化有更完善的理解。因此，本書不僅是對中國婦女財產權利的專門研究，也是對中國財產權利的一般研究。

白凱 (Kathryn Bernhardt)：《中國的婦女與財產：1960-1949年》(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近年來，立足於地方檔案與法庭記錄從而探討中國的法律與社會變遷，是美國著名學者黃宗智、白凱 (Kathryn Bernhardt) 等加州學派所倡導的中國法律、社會與文化研

究的重要內容。除了黃宗智在這個領域已經取得了顯著成績外，作為其妻子與同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教授、《近代中國》(Modern China) 學刊主編之一的白凱也出版了諸多重要研究成果，其中《中國的婦女與財產：1960-1949年》(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1960-1949) 這本關於中國婦女財產權的研究剛一出版，就受到了學界的高度重視，塔爾薩大學 (University of Tulsa) 教授步德茂 (Thomas Buoye) 就曾讚譽白凱在婦女權利與繼承方面的研究是第一流的。在筆者看來，也的確如此。

本書的出發點與內在邏輯在於：從宋至清中國婦女的財產權利經歷了許多重要變化，二十世紀在民國的民法改革後其變化尤為深刻。只有研究中國婦女財產權利的變化，我們才能對中國財產權利作為一個整體的重大變化有更完善的理解。因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正如白凱自己所強調的，本書不僅是對中國婦女財產權利的專門研究，也是對中國財產權利的一般研究。

* 本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近代中國民、商事調解制度的立法與實踐問題研究」(項目批准號04CZS009) 資助。